

Research on Why There were no Long Epics in Ancient China

Quanyou Gong

Chengdu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44000, China

Abstract

As an epic, a long narrative poem with historical role, is the most primitive form of historical description in the world, but there is no long epic in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Tracing back to the origins of the two poetics in the East and the West, due to the late establishment of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historians, the West naturally continued the tradition of using long epic narratives such as the Homeric Epics, while in China, because of the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poetry and music and the strong generaliz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the scale of poetry has been reduced and refined. Due to the early establishment of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historians, "poetry" and "history" were separated into two literary genres, which stifled the formation of epics.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eastern and western social histor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ry genres and discusses why there is no long epic in ancient China.

Keywords

epic; historiography; Chinese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

关于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长篇史诗研究

龚泉又

成都外国语学院, 中国·四川成都 644000

摘要

史诗作为一种具有史学作用的长篇叙事诗,是世界范围内历史记述的最原始形态,但中国古代历史上却没有出现过长篇史诗。从东西方两篇诗学源头追溯,西方由于史官体制化的建立较晚,自然延续了《荷马史诗》类以长篇史诗叙事的传统;中国则因为诗与乐的紧密联系、古代汉语文字的强概括性,显示了诗歌篇幅的规模的缩小化、精炼化。由于史官体制化的较早建立,而使“诗”“史”分离为两种文学体裁,扼制了史诗的形成。论文则基于对东西方社会史学发展与文学体裁的发展研究探讨关于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长篇史诗。

关键词

史诗; 史学; 中西文明

1 引言

史诗作为一种具有史学作用的长篇叙事诗,是世界范围内历史记述的最原始形态,但中国古代历史上却没有出现过长篇史诗。从东西方两篇诗学源头追溯,西方由于史官体制化的建立较晚,自然延续了《荷马史诗》类以长篇史诗叙事的传统;中国则因为诗与乐的紧密联系、古代汉语文字的强概括性,显示了诗歌篇幅的规模的缩小化、精炼化。且由于史官体制化的较早建立,而使“诗”“史”分离为两种文学体裁,扼制了史诗的形成。论文则基于对东西方社会史学发展与文学体裁的发展研究探讨关于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长篇史诗。

2 西方史学体制的建立

西方传统史学的范型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至3世纪史学家修昔底德所著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伯里则评价修昔底德为:“他从这些思想家那儿获取了最大的经验,他懂得去考察和批评史实,摆脱了权威和习俗的偏见。”^[1]在修昔底德的历史书写中继承了一方面希罗多德的“证据意识”,另一方面受到了“智者运动”怀疑主义态度的影响,他承袭普罗泰戈拉唯心观念中“人是万物的尺度”的人本思想,重视对历史真相的调查。其实证精神使之所选取的题材成为一种西方史学的传统题材,即政治军事题材。因此可以看出,整个古典时期的西方史学发展和中国史学中的“求真精神”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但由于中世纪西方史学的体制化过于依赖于基督教的发展,使得其体制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成为神学的附庸,这从西方理论家对于艺术的态度上也极具显现。

古希腊三贤之一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到:“诗

【作者简介】龚泉又(2004-),女,中国四川南充人,在读本科生,从事汉语言文学研究。

比历史更具有哲学性,意义更大。诗描写可能发生的事情,历史描写已经发生的事情。诗所陈述的事具有普遍性,而历史则陈述特殊的事情。”^[2]这句话蕴含着亚里士多德对于艺术和史学的见解,则艺术记录“普遍的已发生过的事”。古希腊人的普遍史学观认为历史的发生是偶然的。因此,在史诗的叙事中呈现了如神学般虚构的成分,这种虚构成分为被用来解释这种偶然性,从而填补普遍性的空缺。而类似于“诗学”与“史学”交织的理论一直持续到中世纪,如文艺复兴三杰之一薄丘伽提出的“诗学与神学相似”,其认为诗是将真理隐藏在表达之中,其“虚拟的特性”具有神圣的教化作用和崇高的实用价值……对诗歌虚构性理论与诗学和神学关联性的肯定,汇入了中世纪时期“用理性证明上帝存在”的思潮之中,使得神学在诗学与史学之间搭起的桥梁,最终通向西方中世纪时期史学体制化的建立——史学为神学服务。

在中世纪,文明、秩序的建立则依赖于哲学、史学对基督教“上帝”和“真理”的解释来完成。公元2世纪至3世纪,巴勒斯坦恺撒里亚地区的基督教主教,即君士坦丁大帝的神学顾问依西比乌斯所著的《编年史》和《教会史》开创了以圣经叙事为主线的历史梳理和叙事。这种主教的权柄和意志影响着后世的基督教史学,并在奥古斯丁时期趋于成熟。西方历史的体制化没有具体的考究,但从基督教史学家依西比乌斯、奥古斯丁与其他重要史家的身份上来说,他们多身居高位或作为修道院的主教等事实上不难发现:在宗教内身居高位的人具有对历史的绝对阐释权,这也是他们职能的体现。

3 西方“以诗叙史”的传统的开辟与延续

15世纪,拉斐尔著名的四幅壁画分别为《神学》《诗学》《哲学》和《法学》,在四种题材中唯独没有“史学”的彰显,这也证明了古典时期史学的凋敝,而诗学则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史学的职能。

西方最早且最具有影响力的长篇史诗为古希腊盲眼诗人荷马创作的《荷马史诗》。由于黑暗时代象形文字的模糊与失传,使《荷马史诗》在长时间内并不以文字内容展现,而是在随着大约在黑暗时代末期,古希腊人引进腓尼基字母创造了古希腊字母,书写技能重返希腊的历史背景下,才在大约在公元前750年到公元前720年期间变成了文字。于是20世纪30年代,古典学学者米尔曼·帕里认为史诗的创作是通过“边吟诵边创作”的程式化形式,从而推断出了《荷马史诗》的创作途径,并给出了一个如今已经被广泛接受的理论——口头程式理论^[3]。口口相传的文学形式使之叙述语言具有“韵文”特性,并在一方面开辟了西方这种“以诗叙史”的传统。

第一部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长诗^[4]是波尔提亚诗人赫西俄德在古风时期创作的《工作与时日》。赫西俄德选取了

与《荷马史诗》截然不同的题材,较详细地记载了古希腊时期的各种历史时段、农时与农事等社会文化,并提出了著名的“历史退步论”。其题材虽然转向现实主义叙事,但内容上依然延续了这种“以诗叙史”的传统。

以上两部可供考究的都是以史诗的方式叙述历史事件,在公元前5世纪,希罗多德《历史》则放弃了具体神话内容的叙述,转向对社会文化的记载。但这并不意味着“神”的地位的倒退,而是通过“神”的不在场证明“神谕”的在场与存在,使现实历史具有一种“命运使然”的性质。这种从神、人到对人全面关注的史学观转变,使其内容需要一种更能承载历史事件的文体来表达,即散文体。但对于《历史》一书散文体的格式,也学者提出了驳论而认为其是一部散文化的史诗^[4]。《历史》原文中:“那时,她虽然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但到早晨刚亮时,她就从自己的仆从之中选出了一些她觉得对她最忠诚的人来……”这种用连接词作时间提示与节奏化的表达,是一种诗歌上的韵文体的天然体现。希罗多德兼具史学家与诗人之长,仍旧保留了诗歌文体的特征,使之诗意化地表现历史。除此之外,在古典时期对于历史书写的作品和题材里,也有着大量类似“修辞化”的历史表达。例如,《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韵律化、煽动性的演说词表达和希腊悲剧式的创作笔法以及后来承袭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史学叙述传统的修辞学派。这些都使得“诗学”与“史学”的关系处在一种暧昧不清的拉扯之中。

“以诗叙史”的传统,使得西方诗歌必须具有“历史”的容量,因此多以长篇的形式出现。“史诗”中的“史”学定义也从“叙史”转向“长篇”,因此开辟了后世的“长篇史诗”,如但丁的《神曲》、弥尔顿的《失乐园》等。

4 中国史官体制化的建立

若从术语方面考究,“史”在甲骨文中已经出现,金文与《尚书》中也有关于史的记载,但史官文职职守的形成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刘知几在《史通·史官建置》中说:“盖史之建官,其来尚矣。昔轩辕氏受命,仓颉、沮诵实居其职。至于三代,其数渐繁……史官之作,笔自黄帝,备于周室”。

黄帝时代的史官保留着“史巫瞽不分”的特征。发展到商代时,人学观念是“天人合一”的人学观念使史官需要承担解释天道的职责,于是史逐渐取代巫瞽而成为天道解释的权威。在周王朝时因为统治者的变更,出现了“天从民意”的人学观念。于是,周代史官的天官掌职渐弱,文职职守显现。《周礼》记叙中史官的职责主要在文献保管、受咨询的职责和负责礼制活动,并不以著史为专职此后人作为主体的核心观念逐渐形成,对天道的解释多转变为统治者权势合理化的辩护,因此史学的纪实特性逐渐发展,汉武帝置太史令,以司马谈任此职修筑国史,司马谈去世后其子司马迁继任,书写《史记》。至此中国古代史官文职职守形成。这种体制

化相较于西方模糊的体制化领先百年之久，并且具有稳定性与持久性，中国的“史民文化”与“以史为鉴”的传统也由此发源。

5 中国“诗”“史”的分离

史诗是历史记述的一种原始形态，如古巴比伦的《吉尔伽美什》、中国西周时期的《诗经》、印度的《罗摩衍那》、藏族的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中国的诗歌在其后续的发展中却走向了与西方完全不同的方面，一是由于中国诗与乐的紧密关系，限制了其篇幅的长短；二是由于诗乐的抒情性，内容上诗歌不再只局限于对史的叙述；三是在体制上，史官不断体制化，其文职职守形成，“史”逐渐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向外发展。

司马迁在《史记》中以“三百五篇孔子皆弦而歌之”^[1]肯定了《诗经》中诗乐相通的关系。再后来，刘勰《文心雕龙》中述说了诗乐一体的关系。《乐府》所述：“乐府者，声依永，律和声也。”诗歌形式的浅显、韵律的和谐使其感染力和传颂度极强，与早期诗歌内容所具备“宣正其文”的教化作用“教化”相适应，成为诗歌艺术口头表现的主要形式。然而，《明诗》所述“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表明诗歌只具有传唱教化的工具。学术界普遍认为音乐起源之一是异化的说话方式，其异化原因就是说话主体所带有的情绪对说话者语气、停顿等的畸变塑造，这种情绪通过话语投射形成了音乐。在诗乐中，音乐通过演唱者的言语将情感折射出来。因此诗乐一体在本质上是一种抒情表达，即诗人内心的再现，在《文心雕龙》中这种情感被解释为“一种感应自然而产生的情感”。例如，《诗经》作为一部史诗，不仅展现了当时社会的各种民风民俗，还被赋予了“诗言志”之用；后来的《古诗十九首》中虽然也有类似记录民风民俗的表现，却依然是通过截取生活的横断面而多表现一种游子思乡之情。由此可见中国诗歌更加注重主体的智慧表达以及对道德和人生的思考。在这一点上，又与西方史学大多数那种“想象性”的虚构不同。

根据《孟子离娄下》的记载：“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杻杻》、鲁之《春秋》。”西周末和春秋时期，周王室以及各诸侯国分别出现了史书类的记述，如《国语》《战国策》。在后世史书类记载的发展演变中文人也时常编纂了野史作为补叙。这说明在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发展历程上，即从《诗经》之后，已不再需要通过诗的手段去承载历史。“史”学逐渐作为一种专门的门类被分离出来，用来作为专门记录历史题材和内容的文学体裁，并在和史官体制化的过程中相互交融。

诗与乐同源已是学界共识。诗乐的相互融合局限了诗歌的篇幅，其对诗歌语言韵律等要求和中国古代文字本质上的强概括性与精炼性，使诗歌不仅在选词时颇为谨慎精巧，内容也不宜过长。再后来由于“诗”“史”的分离，诗歌更多地被作为一种抒情化的表现，而用另一体制化的“史”来纪实。这都显示了对中国长篇史诗形成的遮蔽。

6 中国为什么没有长篇史诗

有今人学者认为“长篇小说是最接近于史诗的一种文体”。而在中国文学的历史发展中，有极长一段时间将“小说家位于九流之外”，这种可以发展为长篇叙事的文体被各种骈文骚赋而取代，小说中的虚构意识被骈文骚赋中的引经据典等取代……诸此种种皆可追溯到东西方“史”“诗”分离的时差影响上。

西方史官体制化行程的滞缓，不仅是因为教皇职权对历史的绝对阐释权，还在于其记述历史的方式主要依赖于如绘画、史诗、戏剧等艺术手段上。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用刻意虚构的成分填补历史偶然性的空缺成为一种记述者的惯用手段。而中国“史学”作为一种较早发展出来的独立的学问，其文职职守的形成使著史内容不同于西方史诗的“虚构性”，转向文本之间有着互相可印证因果关系的纪实文学。这使得诗歌不用承担记述历史的职责，而有着足够的抒情化发展的空间。至此，东西方诗学逐渐走向了不同的传统。

参考文献

- [1] 朝戈金,祝鹏程.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J].民间文化论坛,2015(6):1.
- [2] 亚里士多德.诗学[M].陈中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 [3] 希罗多德.历史[M].一卷.周永强,译.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
- [4] 张光智.西方史学史[M].四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